

第

6

辑

博士文丛



BOSHIWENCONG

颜小华 著

相遇、对话与调适：
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
(1837-1899)



兰州大学出版社



美国长老会在华活动研究

——

相遇、对话与调适：

美国长老会在华的活动研究

（1837—1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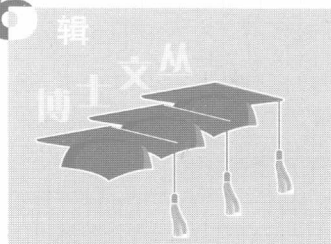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

6

辑



BOSHIWENCONG

颜小华 著

相遇、对话与调适：
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
(1837-189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遇、对话与调适: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

1837~1899/颜小华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3

(博士文丛.第6辑)

ISBN 978-7-311-03061-2

I.相… II.颜… III.基督教史—研究—中国—1837~
1899 IV.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1115 号

博士文丛(第六辑)

相遇、对话与调适:

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

(1837—1899)

颜小华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875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

ISBN 978-7-311-03061-2 定价:220.00 元(共十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早几年前,出版界朋友提出,想让我撰写一部“广东基督教史”。我一听,立即婉言拒绝。为什么?鄙意以为,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在中国学者中尚在起步阶段,所谓各种“基督教史”的专著虽然已出版不少。但真正下大力气研读原始中西文档案而作出精深细致的个案研究实在是不多。发宏论者,高屋建瓴,气贯长虹,有时甚至妙语连珠,发人警省,但于撰史则裨益甚少。为何?并无新史实示人,亦无新资料的扩张。一部中国基督教史有多少空白领域无人涉及,以天主教的修会与基督新教的差会而言,有哪一个修会或差会在中国学者中有专深精细的高质量专著呢?方济各会出了崔维孝先生一本以西班牙文为主体资料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该书质量虽高,但仅仅是西班牙方济各会,也仅仅写到雍正朝,还有意大利方济各会,还有乾隆以后及鸦片战争以后的部分呢?更遑论多明我会、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了。法国学者陆南(Adrien Launay)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史以分省的方式完成了10部专著,我国国内连一部都没有翻译。谁都知道《李安德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学者们多只能望“书”兴叹,因为其原版为拉丁文。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书简集》总算有了中译本,虽

然学界对这部书的翻译有一些意见，但我以为，这仍是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无量功德。然而比法国耶稣会士部头更大，数量更钜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ítas na Ásia*）却只能不时地见到金国平先生透漏的“吉光片羽”，何时能窥其全貌，恐怕还不是三五年之事。基督新教的差会史研究，我读得不多，但有分量及在学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除台湾学者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以外，其他似乎不多见。然而这一领域“泛论性”及“通史型”的著作却决不在少数。进入中国境内新教之差会总数有百余家，有一定规模及一定影响力者至少也有数十家，但有几家新教差会的传播史有人耗它五年、十年的精力对其展开研究呢？像林美玫那样研究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的差会史著作又有几部呢？至少有很多差会还基本处于无人研究之状态。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不论哪个专业领域都会有人去整理、翻译出版它的基本文献与档案，为什么基督新教史就没有人去专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都愿意写书，忙于出著作，“论尽天下基督之事”，结果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档案尘封在库廩之中而未被世人所知。这种悖论在基督教史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我是史料至上主义者，研究一个问题，没有八成的史料把握，我会怯阵。故我不敢接受《广东基督教史》一书的挑战。

举两条广东天主教的史料，以证明做广东基督教史之艰难。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藏雍正十一年（1733）《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各地购地建堂单》：

所买堂之数目开列于左：本家圣而公教会法浪西国远西学仕们在中华各省、各府、各县前后所买之地基、山地及起造成堂之数，现有文约存下在暹罗本家本会学管主教大堂，因中华雍正十年，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圣教毁残，恐后如何，故所遗下之契约半大交与本家本会卜神父，于雍正十一年带至暹罗主教大堂留存永记。今欲有凭，立单为照。

1. 广东省城南海县太平门外油纸巷，又名杨仁南（里）天主堂，买契不在暹罗。

2. 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交塘司新村堡，土名七星岗，图一甲山地一块，现有本家李主教坟，是计老爷买的。

3. 广东增城县白门内龟峰街坐北向南天主堂,康熙三十四年买,陆主教买起,后康熙三十五年白老爷买就。

4. 广东广州府顺德县都宁司上僚村天主堂,康熙三十八年白老爷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5. 广东南雄府始兴县天主堂,照张理诺会长所记是本家的堂,此堂无契在暹罗。

6. 广东龙州府南门外天主堂(白老爷手所起)。

7. 又帽子峰山下养济院小天主堂(是教友之资所起)。

8. 又城内北门内小圣母堂。

9. 韶州府曲江县管下之所名连长洞小天主堂。

10. 韶州府仁化县石塘天主堂,康熙四十四年李主教或李老爷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11. 韶州府乐昌县柵栏门内地名沙提市天主堂,康熙三十二年白老爷买,现有约契在暹罗。

12. 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怀德坊天主堂,颜、梁二位主教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13. 福建厦门张厝草垵上天主堂,康熙二十九年李、颜二位主教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14. 福建福州府福清县西门街天主堂,康熙三十三年李主教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15. 福建长乐县画眉台上天主堂,康熙二十八年李主教买的,现有约契在暹罗。

16. 福建兴化府天主堂,现有本家张神父在此管理教事。

17. 江南池州府郭西街天主堂,康熙三十四年梁主教买,现有约在暹罗。

18. 江南太平府芜湖县河南来远坊西街天主堂,康熙三十五年梁主教买的,现有约在暹罗。

19. 江南江宁府旱西门织造府西边石碑亭巷天主堂,此堂系张会长记录他所到之堂。

20. 浙江严州府建德县纯孝坊右边天主堂,康熙三十五年梁

主教买，现有约契在暹罗。

21.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城皇山脚下天主堂。

22. 湖广郴州南门外田家巷横过三丈天主堂，康熙三十八年李主教或李老爷买，现有约契在暹罗。

23. 云南云南府昆明县天主堂，康熙四十一年李主教买，现有约契在暹罗。

24. 福建建宁府浦城县住城内道观街药材铺余九腾天主堂，此堂系张会长记录。

25. 浙江衢州府江山县清湖镇前河街官客店徐瑞相家天主堂，照张会长记录。

26. 浙江衢州府小西门进城便是天主堂，照张会长记录。

27. 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朱家马头进城便是天主堂，照张会长记录。

28. 平海武盛里宅尾铺任厝村落天主堂，康熙五十五年李主教或李老爷买，现有约契在暹罗。

29. 四川城府都城都县总督街天主堂，白、梁二位老爷起。

30. 城都府北门外簸箕街房屋一所，坟地一块，现有张会长遗下之字。

31. 城都府金堂县下四乡石板河天主堂。

32. 又雅州城内房屋一所。

除此之外，亦不知何处还有天主堂。

雍正十一年暹罗主教大堂记录。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63年成立，1684年第一批外方传教会教士抵达中国，其在中国的传教虽在陆南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资料，而在广东的早期发展，基本上没有任何资料。而上述档案之公布，至雍正十一年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买地建堂已有34处，其中广东就有11处。该会传教士在广东活动几乎无迹可寻，然而却建了如此多的教堂，比耶稣会、方济各会在广东发展还快。它是如何发展的？是由谁来发展的？谁能解答？另一条史料是藏于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士庶致葡萄牙皇太后书》：

广东闽省士庶，谨奏上国皇太后陛下：

为恩深义重不敢背施事。溯自中土开教之始，实由贵国导引之源。梯航九万余里，宣化三百余年，道统相承，流传至今。而贵国历代贤王重义轻财，捐貲传济，建堂设教，养育人才，无非悯中土之沉沦，启圣慈之惠爱。是以京畿省会常沾得化之隆，市井乡闾荷悃悃之美。兹无论于各省，即举粤东而言，凡入华诸位贤哲，无不先至东粤，承宣教化。得领圣化之先者为粤地，受栽培之厚者为粤人。愚顽得其训诲，村社亦被恩施。今兹背邪向正，恒沾圣洗之光，正道流传，俾闻真教之理，皆沐贵国爱主爱人之盛心，而行体仁怀义之善事也。彼都人士共仰鸿恩，溯本追源，捐埃莫报。

今忽有拂郎济亚士，驰入粤省，不由我粤主教命，擅自开权，此明有强夺之形，并吞之势，攘他人久创之业为己业，夺他人已成之功为己功。揆之于理，此贵国所必不能容，而粤省士庶必不能平者也。

夫粤数百年来，蒙贵国优养恩渥，以至于今，一旦割恩断义，转属他人，虽至死宁有不忍为者。而贵国亦常覆荫我粤，两情洽浹，并无织芥之嫌，岂为强暴所逼，弃而不顾，宁忍粤之士庶颠沛流离哉！

从来外国人入内地传教，酿起风波者，指不胜屈。为严緝外国人入内地之禁，粤省为甚。自英吉利失和之后，粤民视洋人如讎敌，偶尔下乡，六命同毙。此众所共知共见者。今拂郎济不明事势，强入内地，必至带累教友，惹祸株连。若为圣教致命，犹所甘心，今为汉奸而死，教友何辜，为此冤孽乎？预知拂郎济司铎入粤，定必扰乱圣教，粤之教友惧祸心切，断不能相容也。为此泣恳皇太后俯赐鸿慈，剖析下情，转奏教宗，评其曲直，审其事势，使知公义所在，不得以威力而相加，爱戴既深，不敢以强弱而变志。爰诉微衷，乞赐睿鉴。

计开联名：

南海会长：黄若翰 李碧端 叶安德肋 颜保禄 朱若瑟 伍亚升

梁若亚敬 吴安当 朱茂祿 黄亚五 刘依纳爵

顺德会长：何若瑟 颜路加 谢安德肋 吕元徽 程保祿 李若瑟
谭安多尼

潮州会长：冯保祿 陈若瑟 程玛弟亚 黄本笃 何若瑟 梁若瑟
区雅各伯

肇庆会长：李二娣 陶若瑟 林奥斯定 陆芳芝 李亚晚 郑安当
符安多尼 全若瑟 苏亚容 冯若翰 梁伯多祿

海南会长：岳亚明 潘郁贤 梁文都辣 符路加 谢若瑟 陈饶经
因名多不能尽录

降生壹千八百四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閩省士庶泣叩

广东天主教从来属澳门教区管辖，亦即受葡萄牙保教权所庇护。然鸦片战争后，这一局势被打乱，“今忽有拂郎济亚（法国）士，驰入粤省，不由我粤主教命，擅自开权。此明有强夺之形，并吞之势，攘他人久创之业为己业，夺他人已成之功为己功。”在天主教尚未在国内开禁之时刻，法、葡两国争夺传教地盘斗争即已开始。难以向人交代清楚的是，上述档案中，广东出现的“南海”、“顺德”、“潮州”、“肇庆”及“海南”等5个教会是何时产生，这5个教会与澳门教区的关系为何？这一段史料说明什么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份档案均是广东基督教史中的重要史料，我估计研究广东基督教史的人多数没有见过。但如何解读？由于其他背景资料不足，很难对这两份档案进行深入的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广东基督教史研究中还大量存在。以此之故，我何以斗胆敢承担《广东基督教史》之重任。

颜小华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我当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比较多，因我就产生了将基督教史中的天主教修会与基督新教差会一个一个开展研究，各人根据自己的外语能力及研究兴趣，一个人抱一套档案，按地区按差会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力求打破基督教史研究较普遍存在的“大而无当”、“空论居多”的现象，以弥补目前基督教史中修会与差会史研究的一些空白。颜小华就拣选了以“美北长老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同学中，小华是以能吃苦耐劳著称的，亦有点“拼命三郎”的精神，人也十分聪敏。英文虽拙于口，但阅

读速度很快。在香港崇基神学院卢龙光教授、牧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在港居停一年,充分利用了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基督教文献典藏及美国长老会的缩微胶卷,这应是他能完成这一“有米之炊”的博士论文的重要保障。以本人之浅学,我认为,小华的美国长老会在华南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料应已备全。研究 19 世纪基督新教在华传播史,中外文史料是严重失衡的,而研究者主要借重于外文史料,故得一原始文献的基督新教之中文史料则尤为可贵。小华在资料搜集上不仅遍寻长老会在华南活动的英文档案,而且在中文档案、文献、地方志及文史资料的搜寻中亦用力颇勤。该书第 3 章《美国长老会在粤传播与发展》写得较为丰满,主要就得力于方志及中文文献的使用。小华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实际只花了两年时间,因为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花在上课及后来的联系工作上。两年时间完成一部洋洋 30 余万言扎实饱满的博士论文,且多为原创,实属不易;亦足以反映小华基督新教史独立研究的能力,这一点早在他与我合作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就已表现出来。因为我对基督新教的英文文献及档案基本不清亦不熟,所知仅是一些常识,因此对小华的指导大致只能在原则上把握,及在写作技巧上予以修饰,不论是资料、观点及文稿的形成均来自于他本人,我只是挂名而已。因此,小华能基本上按照我的计划及要求完成这一差会研究,于我来讲,是很满意的。我早就打算在暨南大学组建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因为在国内,我这里的条件应是比较好的。一是积累了多年的这一领域的资料;二是门下集合了几十名博、硕士研究生;三是大体配有了葡、西、英、法、日几种外语能力的人才。我的设想是天主教留下 2 名博士,基督新教留下 2 名博士,然后分修(差)会,分地区地展开基督教对华传播史的研究,以填补我国基督教修(差)会史及区域史研究中的空白。这是我的奢望,小华即是我计划中留校的理想人选。然而,因缘际会,事与愿违,不仅小华离粤赴桂,我这位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连招牌还没来得及做就挂冠而去。这终究成为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小华寄来这部书稿索序,当然是要我讲些好话,谈点“大义”,以资激扬。我想,好话也不要多讲,“大义”我又不擅长。等书面世,学界自有公论。但我还是要强调两句,一是小华这部书的贡献同两位学者相关,一是

同林美玫女士一样，为中国基督新差会史研究填补了空白，所不同的是林美玫的研究对象是全新原创，而小华的研究对象却有些部分已有较好的成果；二是同吴义雄先生有关。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研究的是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的活动，而小华则将这一研究的一部分延续到义和团运动之前。我以为小华的书亦同吴义雄先生一样在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同属开拓性的作品。但要指出的一点是，小华之书还未完全跳出吴义雄先生的窠臼，这恐怕也是国内学者在基督教对华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过于程式化。是资料的局限，抑或思维之羈縻？我尚未得出认识。

小华在广西师大历史系工作又已是三年，当然，他的学业，他的工作均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然而与我的交往自然也就疏隔了许多。在广州读书时，我多利用午餐同学生们一起吃饭，一是交流工作，二是针砭时局，三是煮酒论英雄。小华自然也是餐桌上的听众与说客。虽然所谈所论并非“真知灼见”，但对学界的针砭与评品绝对有利于提高学生之识见及“品位”。小华亦同我说，他很怀念在广州与老师及同学一起“吃饭聊天”的日子。我的谈话多具煽动性，亦曾煽起不少学生的学术热情，小华亦是我曾煽起学术热情而至今仍执着的学生之一。小华虽不是基督徒，但我想，恐怕在他未来的很长一段人生中，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仍将是他的研究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中，我要推荐三位学者以资小华学习：一是比利时的高华士（Noel Colvers）博士，他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一书，利用一部收藏在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的鲁日满账本手稿，完全可以称之为“一堆凌乱琐碎的‘陈芝麻、烂谷子’”。然而，高华士博士却极为巧妙地利用这些“芝麻、谷子”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江南天主教史真实画卷”（张西平语）。作者对史料的精研细析及利用琐细资料编织宏大网络的能力令人叫绝。我个人认为，此书可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冠。对高华士极为熟悉的韩德力（Jerome Heyndrickx）神父称：“他从来不会进行肤浅而匆促的研究。”这一评价言似平淡，然“肤浅”、“匆促”二蠹，于吾有之，于汝无焉？世何以罕？二是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他的大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利用考古学的手段，遍寻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资料，在陈垣、方豪的基

础上对第一代教徒的奉教心态、因缘、历程及人际网络出人意料地示人以新资料,展示其新结论。既具科学之精确,亦备史家之推证,绝无陈词滥调,处处推陈出新,考证精彩纷呈,文章珠玑满盘。一部属于“小历史”的书在中国学界引起的震动之大,前所未见。据我所知,黄一农教授的著作亦仅此一部,然则已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之桂冠。与国内学者出书之“匆促”相比,小华能悟出点什么呢?三是在基督新教史研究中属于“殊相”的苏精博士。苏博士实乃中国传统学术中“大器晚成”之类,在其年轻时,基本上名不见经传。然临界退休之际的苏博士在近年一连爆出一部19世纪早期基督教史研究著作:1.《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中国,开门!马礼逊及其相关人物研究》;3.《上帝的人马: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可谓部部精彩,篇篇扎实,句句谨严,且别开生面,与我惯见他人的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著作大不相同,于老生常谈的论题中竟暴露出如此众多的“新知”,沿用了近两百年的“蔡高”竟名“蔡轲”。苏博士对英国及香港各档案馆及图书馆收藏的教会文献之熟,及对“绝大部分是手稿”的英文档案用力之勤,在国人中恐无出其右者。很明显,我向小华推荐的高、黄、苏三人无一不是在史料的搜集及运用上高人一筹。也正因为是这史料的高人一筹,才有可能引出他们“高人一筹”的研究著作。虽然小华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曾下过大的力气,但毕竟只有两年之功夫。史家的内涵如无几十年史料的积累,最终还会因底气不足而早衰。我与小华同为湘人,治学、做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湘人敏锐、快捷、果敢,故为其长。然急躁、浮动乃湘人致命之短。五十以后,吾深知己弊,每每警省,常以一事之持恒来磨砺自己。小华是能做学问之人,且是可以做好学问之人。我深信,以小华的聪敏与勤奋,如再加上学习高、黄、苏三位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跨入史学的更高门槛,应在不远之时。

汤开建

己丑年仲春于澳门氹仔徐日昇寅公马路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资料说明	(1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4)
第一章 美国长老会入华前的社会背景	(25)
第一节 19 世纪前基督教的三次入华	(25)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入华前其他新教在华的教务活动	(29)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与中西关系	(36)
第四节 美国国内社会及宗教概况	(40)
第五节 美国长老会及其入华原因	(42)
第二章 美国长老会在新加坡与港澳的活动(1837—1847)	(50)
第一节 美国长老会在新加坡的活动(1837—1841)	(50)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港澳的活动(1841—1847)	(52)
第三章 美国长老会在粤的传播与发展(1847—1899)	(70)
第一节 美国长老会在广州的传教活动	(70)
第二节 广东省内传教外展位的发展	(85)
第四章 美国长老会入桂及其活动(1884—1897)	(117)
第一节 美国长老会入桂前基督教在广西的活动	(117)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广西的活动	(121)
第五章 美国长老会在琼的活动及其发展(1881—1899)	(133)
第一节 天主教在海南的教务活动	(133)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海南的教务活动	(138)
第六章 传教士的文字出版活动及其与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交往	(147)
第一节 在华南活动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及其特点	(147)
第二节 传教士开展的文字出版活动	(158)
第三节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交往	(167)
第七章 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医务活动	(179)
第一节 新教医学传教士来华与中华医务传道会的成立	(179)
第二节 伯驾与广州眼科医局(1835—1855)	(188)
第三节 嘉约翰与博济医院的开创和发展(1855—1899)	(194)
第四节 女医学堂、柔济女医院、芳村精神病院、外展医疗诊所	(247)
第八章 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教育活动	(264)
第一节 教育传教方式的提出与美国长老会在华南的教育活动	(264)
第二节 真光书院——中国教会女学之典范	(273)
第三节 培英书院——华南著名的早期教会中等学校	(308)
第四节 广东格致书院——中国早期教会大学的缩影	(314)
第五节 明心瞽目书院——华南地区盲童教育之先导	(326)
第六节 结语	(330)
参考文献	(336)

一、海外欧美学者的研究概况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是研究中国教会史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研究不但起步较早，而且相对深入，研究视角也更趋于多元化。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发展相当迅速。最早对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起于1830年代，当时有部分来华传教士撰写并出版了一些概述性的传教简史、传记和回忆录。以美国为例，从第一个海外传教团美部会（公理会）于1830年派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随美国商船抵达中国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末，在华之美教士超过1500人。^① 这批传教先行者，抵华后不久便有人开始著书立说，向美国介绍中国的情况，藉以鼓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捐助其在华的传教事业。

在此期间较为突出的教会史著作有卫三畏（S. W. Williams）撰写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1848, 1883）。^② 借助其在华的亲身经历，著者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地貌、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该书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其次，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所编写的《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对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作了统计，是介绍该时期来华教士的一本工具书。此外，美国传教士李卫楼（D. W. Lyon）著的《基督教在华简史》（*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895）一书，也是缘起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对在华新教各团体作了全面的概述和总结。相关人物传记有史迪文斯（G. B. Stevens）的《伯驾的生平、书信与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①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② 目前，该书已经有中文本译著出版。参见[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